

第一辑

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在哪里

在时局艰难的时候，未来的路需要抉择，
国家和民族到底该何去何从？时代先驱者用他
们的责任心和使命感，为大众拨云见日，指点
迷津……

我之爱国主义

陈独秀

伊古以来所谓为爱国者（Patriot），多指为国捐躯之烈士，其所行事，可泣可歌，此宁非吾人所服膺所崇拜？然我之爱国主义则异于是。

何以言之？世之所重于爱国者何哉？岂非以大好河山，祖宗丘墓之所在，子孙食息之所资，画地而守，一群之所托命，此而不爱，非属童昏，即欲效犹太人流离异国，威福任人已耳？故强敌侵入之时，则执戈御侮；独夫乱政之际，则血染义旗。卫国保民，此献身之烈士所以可贵也。

今日之中国，外迫于强敌，内逼于独夫（兹之所谓独夫者，非但专制君主及总统；凡国中之逞权而不恤舆论之执政，皆然），非吾人困苦艰难，要求热血烈士为国献身之时代乎？然自我观，中国之危，固以迫于独夫与强敌，而所以迫于独夫强敌者，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。即今不为拔本塞源之计，虽有少数难能可贵之爱国烈士，非徒无救于国之亡，行见吾种之灭也。

世有疑吾言者乎？试观国中现象，若武人之乱政，若府库之空虚，若产业之凋零，若社会之腐败，若人格之堕落，若官吏之贪墨，若游民盗匪之充斥，若水旱疫病之流行：凡此种种，无一不为国亡种灭之根源，又无一而为献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。外人之讥评吾族，而实为吾人不能不俯首承认者，曰“好利无耻”，曰“老大病夫”，曰“不洁如豕”，曰“游民乞丐国”，曰“贿赂为华人通病”，曰“官吏国”，曰“豚尾客”，曰“黄金崇拜”，曰“工于诈伪”，曰“服权力不服公理”，曰“放纵卑劣”：

凡此种种，无一而非亡国灭种之资格，又无一而为献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。

一国之民，精神上，物质上，如此退化，如此堕落，即人不我伐，亦有何颜面，有何权利，生存于世界？一国之民德，民力，在水平线以上者，一时遭逢独夫强敌，国家濒于危亡，得献身为国之烈士而救之，足济于难；若其国之民德，民力，在水平线以下者，则自侮自伐，其招致强敌独夫也，如磁石之引针，其国家无时不在灭亡之数，其亡自亡也，其灭自灭也；即幸不遭逢强敌独夫，而其国之不幸，乃在遭逢强敌独夫以上，反以遭逢强敌独夫，促其觉悟，为国之大幸。

夫所贵乎爱国烈士者，救其国之危亡也；否则何取焉？今其国之危亡也，亡之者虽将为强敌，为独夫，而所以使之亡者，乃其国民之行为与性质。欲图根本之救亡，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，视所需乎为国献身之烈士，其量尤广，其势尤迫。故我之爱国主义，不在为国捐躯，而在笃行自好之士，为国家惜名誉，为国家弭乱源，为国家增实力。我爱国诸青年乎！为国捐躯之烈士，固吾人所服膺，所崇拜，会当其时，愿诸君决然为之，无所审顾；然此种爱国行为，乃一时的而非持续的，乃治标的而非治本的。吾之所谓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者：

曰勤

《传》曰：“民生在勤，勤则不匮。”今日西洋各国国力之发展，无不视经济力为标准。而经济学之生产三要素：曰土地，曰人力，曰资本。夫资本之初源，仍出于土地与人力。土地而不施以人力，仍不得视为财产，如石田童山是也。故人力应视为最重大之生产要素。一社会之人力至者，其社会之经济力必强；一个人之人力至者，其个人之生计，必不至匮乏；此可断言者也。

晰族之勤勉，半由于体魄之强，半由于习惯之善。吾华惰民，即不终朝闲散，亦不解时间上之经济为何事，可贵有限之光阴，掷之闲谈而不惜

焉，掷之博弈而不惜焉，掷之睡眠宴饮而不惜焉。西人之与人约会也，恒以何时何分为期，华人则往往约日相见；西人之行路也，恒一往无前，华人则往往瞻顾徘徊于中道，若无所事事。劳动神圣，晰族之恒言；养尊处优，吾华之风尚。中人之家，亦往往仆婢盈室；游民遍国，乞丐载途。美好丈夫，往往四体不勤，安坐而食他人之食。自食其力，乃社会有体面者所羞为，宁甘厚颜以仰权门之余沥。呜乎！人力废而产业衰，产业衰而国力堕，爱国君子，必尚乎勤！

曰俭

奢侈之为害，自个人言之，贪食渔色，戕害其生，奢以伤廉，堕落人格。吾见夫世之倒行逆施者，非必皆丧心病狂，恒以生活习于奢华，不得不捐耻昧心，自趋陷阱。自国家社会言之，俗尚奢侈，国力虚耗，在昔罗马、西班牙之末路，可为殷鉴。消费之额，不可超过生产，已为经济学之定则。况近世工商业兴，以机械代人力，资本之功用，卓越前世。国民而无贮蓄心，浪费资财于不生产之用途，则产业凋敝，国力衰微，可立而俟。

吾华之贫，宇内仅有。国民生事所需，多仰外品。合之赔款国债，每岁正货流出，穷于计算，若再事奢侈，不啻滴尽吾民之膏血，以为外国工商业纪功之碑，增加高度。人人节衣省食，以为国民兴产殖业之基金，爱国君子，何忍而不出此？

曰廉

呜乎！金钱罪恶，万方同慨。然中国人之金钱罪恶，与欧美人之金钱罪恶不同，而罪恶尤甚。以中国人专以造罪恶而得金钱，复以金钱造成罪恶也。但有钱可图，便无恶不作。古人云：“文官不爱钱，武官不怕死，则天下治矣。”不图今之武官，既怕死又复爱钱。若龙济光、张勋辈，岂真有何异志与共和为敌；只以岁蚀军饷数百万，累累者不肯轻弃，遂不恤

倒行逆施耳。袁氏叛国，为之奔走尽力者遍天下，岂有一敬其为人，或真以帝制足以救国者，盖悉为黄金所驱使（严复明白宣言曰：余非帝国派，惟有钱而无不与耳）。袁氏歿，其子辈于白昼众目之下，悉盗公物以去，视彼监守边郡，秘窃宝器者，益无忌惮矣。

夫借债造路，丧失利权，为何等痛心之事，只以图便交通，忍而出此。乃竟有路未寸成，而借款数千万悉入私囊者，人之无良，一至于此！又若金州画界，胶州画界，利敌贿金，蒙蔽溢与，其罪恶更有甚焉！至于革命乃何等高尚之事功，革命党为何等富于牺牲精神之人物，宜不类乎贪吏矣，而恃其师旅之众，强取横夺，满载而归者，所在多有。此外文武官吏，及假口创办实业之奸人，盗取多金，荣归乡里，俨然以巨绅自居者，不可胜数，社会亦优容之而不以为怪。甚至以尊孔尚德之圣人自居者，亦复贪声载道。呜乎！“贪”之一字，几为吾人之通病，此而不知悔改，更有何爱国之可言！

曰洁

西洋人称世界不洁之民族，印度人，朝鲜人，与吾华，鼎足而三。华人足迹所至，无不备受侮辱者，非尽关国势之衰微，其不洁之习惯，与夫污秽可憎之辫发与衣冠，吾人诉之良心而言，亦实足招尤取侮。公共卫生，国无定制。痰唾无禁，粪秽载途。沐浴不勤，臭恶视西人所畜犬马加甚。厨灶不治，远不若欧美厕所之清洁。试立通衢，观彼行众，衣冠整洁者，百不获一，触目皆囚首垢面，污秽逼人，虽在本国人，有不望而厌之者，必其同调。欲求尚洁之晰人不加轻蔑，本非人情。

然此犹属外观之污秽，而其内心之不洁，尤令人言之恐怖。经数千年之专制政治，自秦政以讷洪宪皇帝，无不以利禄奔走天下，吾国民遂沉迷于利禄而不自觉。卑鄙齷齪之国民性，由此铸成。吾人无宗教信仰心，有之则做官耳，殆若欧美人之信耶稣，日本人之尊天皇，为同一之迷信。大小官吏，相次依附，存亡荣辱，以此为衡。婢膝奴颜，以为至乐。食力创业，乃至高尚至清洁适于国民实力伸张之美德，而视为天下之至贱，不屑为也。

农弃畎亩以充厮役，工商弃其行业以谋差委，士弃其学以求官，驱天下生利之有业者，而为无业分利之游民，皆利禄之见为之也。闻今之北京求官谋事者，数至二十万众。此二十万众中，其多数本已养成无业游民之资格，吾知其少数中未必无富有学识经验之人，可以自力经营相当事业者，而必欲投身宦海，自附于摇尾磕头之列。毋亦利禄之心重，而不知食力创业为可贵也。不能食力者，必食他人之食；不思创业者，自绝生利之途。民德由之堕落，国力由之衰微。此于一群之进化，关系匪轻，是以爱国志士，宜使身心俱洁。

曰诚

浮词夸诞，立言之不诚也；居丧守节，道德之不诚也；时亡而往拜，圣人之不诚也。吾人习于不诚也久矣。以近世事言之，袁氏之称帝也，始终表里坚持赞成反对者，吾皆敬其为人。乃有分明心怀反对者也，而表面竟附赞成之列，朝犹劝进，夕举义旗，袁氏不德，固应受此揶揄，而国民之诈伪不诚，则已完全暴露。其上焉者谓为从权以伺隙，其下焉者诡曰逢恶以速其亡。吾心固反对帝制者也，不知若略迹论心，即筹安六人，去杨、刘外，何尝有一人诚心赞成帝制？惟其非诚心赞成而赞成之者，其人格远在诚心赞成而赞成之者之下：明知故犯，其罪加等！此何等事，而云从权逢恶，则一旦强敌压境夺国，不知其从权逢恶也，更演何丑态，作何罪孽？此外人所以谓法兰西革命为悲剧的革命，而华人革命乃滑稽剧也。

若张勋，倪嗣冲，陈宦，汤芑铭，龙济光，张作霖，王占元辈，本诚心赞成帝制者也，乃袁氏一去，或叛袁独立，或仍就共和政府之军职，视昔之称扬帝制痛骂共和也，前后竟若两人。孙毓筠非供奉洪宪皇帝之御容，称以今上圣主万岁者乎？乃帝制取消时，与其友书，竟有袁逆之称。其他请愿劝进之妄人，今又复正襟厉色以言民权共和者，滔滔皆是。反覆变诈，一至于斯，诚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也！呜呼！不诚之民族，为善不终，为恶亦不终。吾见夫国中多乐于为恶之人，吾未见有始终为恶之硬汉。诈伪圆滑，

人格何存？吾愿爱国之士，无论维新守旧，帝党共和，皆本诸良心之至诚，慎厥终始，以存国民一线之人格。

曰信

人而无信，不独为道德之羞，亦且为经济之累。政府无信，则纸币不行，内债难得，其最大之恶果，为无人民信托之国家银行，金融大权，操诸外人之手。人民无信，则非独资无由创业。当此工商发达时代，非资本集合，必不适于营业竞争。而吾国人之视集资创业也，不啻为骗钱之别名。由是全国资金，皆成死物，绝无流通生长之机缘。以视欧美人之资财，衣食之余，悉贮之银行，经营产业，息息流通，递加生长也，其社会金融之日就枯竭，殆与人身之血不流行，坐待衰萎以死，同一现象。是故民信不立，国之金融，决无起死回生之望。政府以借债而存，人民以盗窃而活，由贫而弱，由弱而亡，诟不滋痛！

之数德者，固老生之常谈，实救国之要道。人或以为视献身义烈为迂远，吾独以此为持续的治本的真正爱国之行为。盖今世列强并立，皆挟其全国国民之德智力以相角，兴亡之数，不待战争而决。其兴也有故，其亡也有由。唯其亡之已有由矣，虽有为国献身之烈士，亦莫之能救。故今世爱国之说与古不同，欲爱其国使立于不亡之地，非睹其国之亡始爱而殉之也。夫国亡身殉，其义烈固自可风，若严格论之，自古以身殉国者，未必人人皆无制造亡国原因之罪。故爱其国使立于不亡之地，爱国主义，莫隆于斯。

阅读札记

故我之爱国主义，不在为国捐躯，而在笃行自好之士，为国家惜名誉，为国家弭乱源，为国家增实力。

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

陈独秀

南海康有为先生，为吾国近代先觉之士，天下所同认。吾辈少时，读八股，讲旧学，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，以为皆洋奴，名教所不容也。前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，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，粲然可观，茅塞顿开，觉昨非而今是。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，其源泉乃康、梁二先生之赐。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，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。厥后任公先生且学且教，贡献于国人者不少，而康先生则无闻焉。不谓辛亥以还，且于国人流血而得之共和，痛加诅咒。《不忍》杂志，不啻为筹安会导其先河。天下之敬爱先生者，无不先生惜之！

中国帝制思想，经袁氏之试验，或不至死灰复燃矣，而康先生复于别尊卑，重阶级，事天尊君，历代民贼所利用之孔教，锐意提倡，一若惟恐中国人之“帝制根本思想”或至变弃也者。近且不惜词费，致书黎、段二公，强词夺理，率肤浅无常识，识者皆目笑存之，本无辩驳之价值。然中国人脑筋不清，析理不明，或震其名而惑其说，则为害于社会思想之进步也甚巨，故不能已于言焉。

惟是康先生虽自夸“三周大地，游遍四洲，经三十国，日读外国之书”，然实不通外国文，于外国之论理学，宗教史，近代文明史，政治史，所得甚少，欲与之析理辨难，知无济也。

曷以明其然哉？原书云：“今万国之人，莫不有教，惟生番野人无教。今中国不拜教主，岂非自认为无教之人乎？则甘认与生番野人等乎？”按台湾生番及内地苗民，迷信其宗教，视文明人尤笃。则人皆有教，生番野人无教之大前提已误。不拜教主，且仅指不拜孔子，竟谓为无教之人乎？

则不拜教主即为无教之小前提又误。大小前提皆误，则中国人无数与生番野人等之断案，诉诸论理学，谓为不误，可乎？是盖与孟子“无父无君，是禽兽也”之说，同一谬见。故知其不通论理学也。

欧美宗教，由“加特力教”（Catholicism），一变而为“耶稣新教”（Protestantism），再变而为“唯一神教”（Unitarianism），教律宗风，以次替废。“唯一神教”，但奉真神，不信三位一体之说，斥教主灵迹为惑世之诬言，谓教会之仪式为可废。此稍治宗教史者所知也。德之倭根，法之柏格森，皆当今大哲，且信仰宗教者也（倭根对于一切宗教皆信仰，非只基督教已也。），其主张悉类“唯一神教派”，而主教之膜拜，教会之仪式，无所蔑视。审是，西洋宗教，且已由隆而之杀。吾华宗教，奉不隆重，况孔教绝无宗教之实质（宗教实质，重在灵魂之救济，出世之宗也，孔子不事鬼，不知死，文行忠信，皆人世之教，所谓性与天道。乃哲学，非宗教。）与仪式，是教化之教，非宗教之教。乃强欲平地生波，惑民诬孔，诚吴稚晖先生所谓“凿孔栽须”者矣！

君权与教权，以连带之关系，同时削夺，为西洋近代文明史上大书特书之事。信教自由，已为近代政治之定则。强迫信教，不独不能行之本国，且不能施诸被征服之属地人民。其反抗最烈，影响最大者，莫如英国之“清教徒”，以不服国教专制之故，不惜移住美洲，叛母国而独立。康先生蔑视佛、道、耶、回之信仰，欲以孔教专利于国中，吾故知其所得于近世文明史政治史之知识必甚少也。然此种理论，必为康先生所不乐闻，即闻之而不予心研究，则终亦不甚了了。吾今所欲言者，乃就原书中，指陈其不合事实，缺少常识，自相矛盾之言，以告天下，以质之康先生。

康先生电请政府拜孔尊教，南北报纸，无一赞同者；国会主张删除宪法中尊孔条文，内务部取消拜跪礼节，南北报纸，无一反对者。而原书一则曰“当道措施，殊有令国人骇愕者”，再则曰“国务有司所先行，在禁拜圣令，天下骇怪笑骂”！吾知夫骇愕笑骂者，康先生外宁有几人？乌可代表国人，厚诬天下？此不合事实者一也。

欧洲“无神论”之哲学，由来已久，多数科学家，皆指斥宗教之虚诞，

况教主耶？今德国硕学赫克尔，其代表也。“非宗教”之声，已耸动法兰西全国，即尊教信神之“唯一神教派”，亦于旧时教义教仪，多所吐弃。而原书云：“数千年来，无论何人何位，无有敢议废拜教主之礼，黜教主之祀者。”不知何所见而云然？此不合事实者二也。

吾国四万万人，佛教信者最众。其具完全宗教仪式者，耶、回二教，遍布国中，数亦匪鲜。而原书云：“四万万人民犹在也，而先自弃其教，是谓无教。”又云：“今以教主孔子之神圣，必黜绝而力攻之，是导其民于无教也。”以不尊孔即为无教，此不合事实者三也。

原书命意设词，胥乏常识；其中最甚者，莫若袭用古人极无常识之套语：曰，以“春秋”折狱；曰，以《三百篇》作谏书；曰，以“易”通阴阳；曰，以《中庸》传心；曰，以《孝经》却贼；曰，以《大学》治鬼；曰，以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。吾且欲为补一言，曰，以《禹贡》治水，谅为先生所首肯！

夫《春秋》之所口诛笔伐者，乱臣贼子也；今有狱于此，首举叛旗，倾覆清室者，即原书所称“缙衣好贤宵旰忧劳”之今大总统，不知先生将何以折之（辛亥义师起，康先生与其徒徐勤书，称之曰贼曰叛，当不许以种族之故，废孔教之君臣大义也。）？所谓以《大学》治鬼者，未审与说部“绿野仙踪”所载齐贡生之伎俩如何？所谓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，不识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，“天下有道，则庶人不议”等语，是否在此半部中也？

呜乎！先生休矣！先生轻轻以为议院，国务院，无擅议废拜废祀之权，一面又乞灵议院，“以孔子为大教，编入宪法，要求政府。”“明令保守府县学宫及祭田，皆置奉祀官。”（以上皆原书语。）夫无权废之，何以有权兴之？

然此犹矛盾之小者也。孔教与帝制，有不可离散之因缘；若并此二者而主张之，无论为祸中国与否，其一贯之精神，固足自成一说。不图以曾经通电赞成共和之康先生，一面又推尊孔教；既推尊孔教矣，而原书中又期以“不与民国相抵触者，皆照旧奉行”。主张民国之祀孔，不啻主张专制国之祀华盛顿与卢梭，推尊孔教者而计及抵触民国与否？是乃自取其说

而根本毁之耳，此矛盾之最大者也！

吾最后尚有一言以正告康先生曰：吾国非宗教国，吾国人非印度犹太人，宗教信仰心，由来薄弱。教界伟人，不生此土，即勉强杜撰一教宗，设立一教主，亦必无何等威权，何种荣耀。若虑风俗人心之漓薄，又岂干禄作伪之孔教所可救治？古人远矣！近代贤豪，当时耆宿，其感化社会之力，至为强大；吾民之德敝治污，其最大原因，即在耳目头脑中无高尚纯洁之人物为之模范，社会失其中枢，万事循之退化。（法国社会学者孔特，谓人类进化，由其富于模仿性，英雄硕学，乃人类社会之中枢，资其模仿者也。）若康先生者，吾国之耆宿，社会之中枢也，但务端正其心，廉洁其行，以为小子后生之模范，则裨益于风俗人心者，至大且捷，不必远道乞灵于孔教也。

阅读札记

作者认为社会风气败坏最大的原因在于“耳目头脑中无高尚纯洁之人物为之模范，社会失其中枢，万事循之退化”，规劝康有为应“端正其心，廉洁其行，以为小子后生之模范”，如此则“不必远道乞灵于孔教也”。

五年来之教训

梁启超

民国而犹有五年耶？去年今日，吾侪始愿不及此有五年之今日。其殆可以五十年、五百年、五千年，以传诸无穷。何则？此几几不可复得之民

国五年，居然能起诸墟墓而返诸云霄，是则彼苍苍之所以厚我中国者云胡可量！譬犹修证之家，中经魔劫，而道力乃以之益坚，所证之果，遂将永不退转。我民国纪念中断数月，而复有今日之继绳光大，正所以为国体加一重坚确之保障，而永厝诸泰山之安。此我国民所为对于今年今日怀抱一种特别浓挚之感情，而非循常庆祝之所可伦拟也。夫国体不定，则更无政治之可言。然谓国体既有所归，即足以毕政治之能事，其毋乃太早计。尝思五年前建立此国体之目的，原为惩前此政治之极敝，而不得不出于改弦。而此五年内国体之所以翻覆漂摇，仍为前此政治之敝一未消除，且多为途以益其敝，故随时所发生之结果，无一焉能与最初所期待者相应。过去之明效大验，则既若是矣，我国民今年今日方又挟无穷之新希望，以期待于将来。而结果能否与希望相应，则尝视各方面担荷国事之要人能否有所悔悟，以力反其前者之所为以为断。语曰：“不知来，视诸往。”又曰：“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”此五年来经过之陈迹，贻吾侪以深切显豁之教训者，不知凡几，特患吾人善忘耳。苟其不忘，则此种教训之所以厚我中国者，更云何可量也！

第一之教训，能使吾侪知世界潮流不可拂逆，凡一切顽迷复古之思想，根本上不容存在于今日。强欲逆流而溯，决无成绩，徒种恶因。试观袁氏自民国三年以后，所以奖励旧思想、旧形式者，无所不用其极。袁氏用心何在，姑勿深论，然国中确有一大部分人，于彼之此等行动深表同情，以为是可以挽道德之堕落，防秩序之紊荡。究其结果，曷尝有丝毫之效？除浸淫以酿成帝制外，更何所得？须知中国今日过渡时代种种混沌棼泯之现象，实由受国外物质上、精神上之变迁刺激，社会骤呈异状，而固有传来之条教，渐失其范围持载之力，人心彷徨，无所皈依，是以及此。今而欲藉复古以救敝，其诊证之误，全属倒果为因；其疗治所施，必且缘药增病。是故自今以往，吾不敢保国中混沌棼泯之状态不赓续发生。吾侪亦深感此种状态之苦痛，而眈眈然思所以救济之。虽然，吾侪惟当察现今世界大势所趋，为国民谋辟生计上之新纪元，观社会中心力之迁移，为国民谋树思想上之新基础，使物质、精神两方面各能渐收去瘀生新之效，庶前途之希

望可以不虚而断；不容惩羹吹齏，矫角杀牛，以屡服不效之方，治变证离奇之病。政府事业有然，社会事业亦有然，吾窃虑以现在国人望治之切，厌乱之深，当此混沌棼泯之状态赓续之时，反动潮流或已潜伏，其尤悖者，乃至讴歌袁氏，神往前清。此种谬想，吾侪不敏，决不敢承。须知今日社会上种种病征，半由世界文明进化之轨不相顺应，半由承受前清及袁氏之遗毒而食其恶报。拔本塞源，何涂之从，端可识矣。此吾侪不可忘之教训一也。

第二之教训，能使吾侪知凡百公私举措，皆万不可驰于极端；能使吾侪知凡有势力者，万不可滥用其势力以至过度；能使吾侪知中国各派势力之竞争，为事势上所不能免，抑亦不足为病。虽然，竞争必须有轨道、有范围，一面力求自力之伸张，一面仍许容他力之存在。苟逾此闲，虽强必败。试观自辛亥革命起以迄民国二年春夏之交，同盟会、国民党之极端何如，而其所生所受之结果何如者？试观民国二年秋冬以降迄去岁帝制发生，袁氏及旧官僚之极端何如，而其所生所受之结果又何如者？彼两造者，皆各育其相当之势力，因时会之凑合，绰然有发展巩固之余地。苟能善慎用之，常留有余使不尽，则必能相均剂、相救正，自力既永永不坠不断，而国家即隐受其赐。顾乃不然，各皆过信自力之伟大，纯然无视他力，凡自力可以伸张之处，则无所不用其极，譬犹弯弓，非断弦或折臂焉，而不肯放止也；他力足为我伸张之障者，务蹙之使不能自存。试观元二年之交，国民党所掌握之数省，所以待遇异己者，岂不如是耶？试观三四年以降，袁氏所以待遇异己者，又岂不如是耶？究其结局，则异己之势力曷尝能翦除？岂惟不能翦除，徒使国民对于我生愤嫉之心，对于彼起怜敬之念。故反动一起，荣悴转瞬而易位也。夫五年间成败兴仆之迹，岂之历历在人耳目也哉？自今以往，犹有思蹈斯辙者乎？无论出于何方面，而成败兴仆，亦必悉循前轨，其飞升愈高，则其颠蹶愈惨，可断言也。夫国中既有异性之势力两三种以上同时存在，欲以一势力自专于身而消灭其他势力，此为绝对不能之事。故所以因应者惟有三法：一则在轨道内自由竞争，使劣败者自归淘汰；一则以互相容纳、互相接触之结果，双方之性质各去其泰甚，渐变而渐趋

于近。近世立宪政治之作用，其所以能置国家于治安而进于高明者，皆赖是也。若如五年来吾侪所经之噩梦，甲兴于坛，则乙必仆于地，乙兴甲仆，为状亦同。兴仆报复，迭为循环，民之不聊，国之无幸固已，即势力家之自身，亦宁有利者？《书》曰：“我不可不鉴于有夏，亦不可不鉴于有殷。”此吾侪不可忘之教训二也。

第三之教训，能使吾侪知凡身任一事，而以个人之利害或一党派之利害为本位者，其结果必失败；能使吾侪知权术之为物，决不足以驭人，而惟足以自毙。夫身任国事者，而诚能纯以国家之利害为本位，则必无所借于权术；凡用权术者，必其有私利害之见存者也。纯乎私者，则个人本位之利害是已；介乎公私之间者，则党派本位之利害是已。夫苟以党派利害置于国家利害之上，非党派中之各个人欲遂其私者不至此，果尔，则亦纯乎私已耳。惟营私，故不得不乞灵于权术，然权术之为用，乃适所以自穷。试观好用权术且善用权术之人，当世孰能出袁氏右者？袁氏之兴恒于斯，其败亦恒于斯。当其钩心斗角、渊渊入微之际，其失败之机即伏焉；及其操纵指挥、踌躇满志之时，而死神已踞室矣。夫人之不可以欺而天之不可以狎，若是其昭昭也。无袁氏之天才，无袁氏之凭借，而欲师袁氏之故智者，其结果更当何若也？等而下之，自身绝无能力，不足为轻重于社会，而惟务乘间抵隙，排挤挑拨，东含一沙，西喷一血，汨浊河流，冀有渔获者，其结果更当何若也？昔陈千以心计太工，自知无后。试观古今史乘所载，以智机自豪之士，能全始终者究有几人。况今勿事远征，此五年中赫赫具瞻之人，其权术之取径与权术之收场，既悉数演入电戏影片中，予吾侪以共见。立乎今日，以指既往，彼其人所为憧憧扰扰者，是亦不可以已乎！立乎今日，以揣将来，彼追步彼人而学其憧憧扰扰者，是亦不可以已乎！此吾侪不可忘之教训三也。

呜呼！此五年之日月虽短，而历朝末叶之怪状，并世乱邦之丑剧，不啻为一缩影以陈于吾侪目前。苟能稍留意以观其因果之相乘，则在在皆最良之教训。吾所枵触万端，此未尽其什一也。昔管仲告齐桓公曰：“愿君毋忘在莒，愿臣毋忘槛车。”今国中无论何界何系之人，此五年中其孰不

经一二度之深痛巨创！人人各有所毋忘，则国家赖之矣。

呜呼，毋忘！毋忘！呜呼，吾其如此健忘之民何！

阅读札记

民国建国五年以来，经验教训很多，作者列举“复古思想”，“极端主义”，“权术利害”为“吾侪不可忘之教训三也”，希望后来者能“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”。

新的！旧的！

李大钊

宇宙进化的机轴，全由两种精神运之以行，正如车有两轮，鸟有两翼，一个是新的，一个是旧的。但这两种精神活动的方向，必须是代谢的，不是固定的；是合体的，不是分立的，才能于进化有益。

中国人今日的生活全是矛盾生活，中国今日的现象全是矛盾现象。举国的人都在矛盾现象中讨生活，当然觉得不安，当然觉得不快，既是觉得不安不快，当然要打破此矛盾生活的阶级，另外创造一种新生活，以寄顿吾人的身心，慰安吾人的灵性。

矛盾生活，就是新旧不调和的生活，就是一个新的，一个旧的，其间相去不知几千万里的东西，偏偏凑在一处，分立对抗的生活。这种生活，最是苦痛，最无趣味，最容易起冲突。这一段国民的生活史，最是可怖。

欲研究一国家或一都会中某一时期人民的生活，任取其生活现象中的

一粒微尘而分析之，也能知道其生活全部的特质。一个都会里一个人所穿的衣服，就是此都会里最美的市场中所陈设的；一个人的指爪上的一粒炭灰，就是由此都会里最大机械场的烟突中所飞落的。既同在一个生活之中，刹刹尘尘都含有全体的质性，都着有全体的颜色。

我前岁在北京过年，刚过新年，又过旧年。看见贺年的人，有的鞠躬，有的拜跪，有的脱帽，有的作揖，有的在门首悬挂国旗，有的张贴春联，因而起了种种联想。

想起黄昏时候走在街头，听见的是更夫的梆子丁丁地响，看见的是站岗巡警的枪刺耀耀地亮。更夫是旧的，巡警是新的。要用更夫，何用巡警？既用巡警，何用更夫？

又想起我国现已成了民国，仍然还有甚么清室。吾侪小民，一面要负担议会及公府的经费，一面又要负担优待清室的经费。民国是新的，清室是旧的，既有民国，那有清室？若有清室，何来民国？

又想起制定宪法。一面规定信仰自由，一面规定“以孔道为修身大本”。信仰自由是新的，孔道修身是旧的。既重自由，何又迫人来尊孔？既要迫人尊孔，何谓信仰自由？

又想起谈论政治的。一面主张自我实现，一面鼓吹贤人政治。自我实现是新的，贤人政治是旧的。既要自我实现，怎行贤人政治？若行贤人政治，怎能自我实现？

又想起法制习俗。一面立禁止重婚的刑律，一面许纳妾的习俗。禁止重婚的刑律是新的，纳妾的习俗是旧的。既施刑律，必禁习俗；若存习俗，必废刑律。

以上所说不过一时的杂感，其余类此者尚多。最近又在本志上看见独秀先生与南海圣人争论，半农先生向投书某君棒喝。以新的为本位论，南海圣人及投书某君最少应生在百年以前。以旧的为本位论，独秀、半农最少应生在百年以后。此等“风马牛不相及”的人物思想，竟不能不凑在一处，立在同一水平线上来讲话，岂不是绝大憾事？中国今日生活现象矛盾的原因，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，活动又相邻太近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新旧之间，